

大學衍義補卷

丘濬評傳

明 閣下 國子監祭酒 丘 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李焯然 著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主编

匡亞明

中国

思想

家

評

傳

叢

書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

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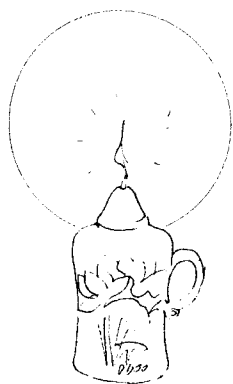
于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

前之知者也理與事知與行其實互相資焉

前之知者也理與事知與行其實互相資焉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丘濬评传

李焯然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濬评传 / 李焯然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7-305-04425-3

I. 丘... II. 李... III. 丘濬(1421~1495)—评
传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926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丘濬评传

李焯然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210093

电话: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025-83328362

网址:<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nupressl@publicl.ptt.js.cn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5 千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7-305-04425-3/B·337

定价:28.00 元



香港大学藏清刊本《丘文庄公集》卷前丘濬像

吐蕃遣使求和

鑒用監察御史魏靖言命蘇頌按雪冤獄

河東採訪使張循憲薦為平鄉尉張嘉貞以為

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春正月帝在東宮

三月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既

鑒以張易之譖敗同平章事魏元忠為尚書

尉流鳳閣舍人張說于嶺南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春正月帝在東宮

楊再思以諂媚得為內史左補闕戴令言以

譴再思貶長社令

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薦張柬之以為

同平章事

鑒娶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

昌宗伏誅肅顯復位大赦改元

世史正綱卷三十一
○元世史

史而謂之世者何舉一世言之也天處乎

上地處乎下人處乎中人所處之處是則

所謂世也世即所謂天下也民生有欲無

主乃亂天生蒸民必命一人主天下以任

世道之責得其人則華華夷夷各止其所

而不相侵亂否則土地為之分裂人類為

之混殽史綱之作必加世於國號之下以

見此一時之君臣民事物凡在斯世者皆

具於是史之中焉是故有華夏純全之世

漢唐是也有華夏割據之世三國是也有

華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

華夷混亂之世東晉及五代是也若夫朝

元入主中國則又為夷狄純全之世焉噫

世道至此壞亂極矣此世史正綱所由作

元世祖 太祖 成吉思汗

元主 忽必烈 至元十七年

嗚呼孔子春秋絕筆之徒至是一千八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 亚 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522页。

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241页。

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

“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

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耄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内 容 简 介

丘濬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中央重臣，曾担任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代史家称他为“中兴贤辅”、“当代通儒”。虽然他是明代深具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但过去有关他的研究却甚为贫乏，致使他的贡献一直湮没无闻。

本书通过对丘濬的生平、著述和从政经历的探讨，以剖释他在成化、弘治两朝政治改革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其中特别指出丘濬在弘治初期对孝宗皇帝的辅佐，从而缔造史家所称颂的弘治“治世”。

前言

四十多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 L. Carrington Goodrich 和房兆楹(Chaoying Fang)的领导之下,召开了规模庞大的明代名人传记编撰计划,并发动了世界各地的明史专家共 125 人参与其事,堪称盛举。当时美国的学者已经感觉到编撰明人传记的需要和迫切,才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去赞助这项动用庞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终于在 1976 年完成,并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搜罗明代重要人物,虽然每个人物都只是三五页的简短传记,但因为每一位撰稿人都是研究该历史人物的专家,书写态度严谨,立论有一定的代表性,成为研究明代历史最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事隔三十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部新的著作可以取代它的地位。我对明代人物的研究,受《明代名人传》的启发良多,书中吴缉华、黄仁宇两位先生合撰的《丘濬传》,更是我后来从事丘濬研究的启蒙文章。

人物的研究对了解历史的片断至为重要,因为没有“点”的积累就不可能有“面”的建构。在明代的历史中,明中叶是较少人注意的时代,而明中叶历史人物的研究就更加是凤毛麟角。丘濬虽然被明人誉为“当代通儒”、“中兴贤辅”,是明中叶的重要人物,但过去未见有著作对他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探讨,这不但影响我们对这位明中叶大臣思想言行的认识,而且对了解明中叶的历史,尤其是孝宗一朝的政治,更是一个颇为严重的决口。

近人对丘濬的著述,最早为 1898 年琼山教谕王国宪的《丘文庄公年谱》,此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有关丘濬最详细的传记资料。1936 年,陈沅根据田野调查,发表《丘海里墓记》^①,为丘濬故乡的史迹提供了新的材料。其后,有关丘濬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加。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大约有七八篇关于丘濬生平、思想、著述或诗歌的著作发表,其中包括陈恒升的《明儒丘琼台的思想概观》^②;林光灏的《明代大儒丘琼山幼年趣事》^③、《丘琼山诗话》^④;王万福的《丘琼山之著述与思想》^⑤;杨群的《明代大儒丘文庄公》^⑥等。1978 年中国丘海学会在台北成立,并出版了《中国丘海学会会刊》、《丘海学术研究汇编》、《丘海季刊》等刊物,这对丘濬的研究具有推动作用。尤

① 《丘海里墓记》四卷,见《韵古楼丛书》收。其后亦收入《广州学报》第 1 卷第 2 期,1937 年 4 月,第 1~21 页。

② 《人生》第 31 卷第 5 期,1966 年 9 月,第 22~27 页。

③ 《艺文志》第 6 期,1966 年 3 月,第 10~13 页。

④ 《广东文献》第 7 卷第 2 期,1977 年 6 月,第 66~69 页。

⑤ 《广东文献》第 3 卷第 1 期,1973 年 3 月,第 11~24 页。

⑥ 《华学月刊》第 50 期,1976 年 2 月,第 46~52 页。

其是早在 1972 年,该学会的一些成员组成辑印委员会出版《丘文庄公丛书》,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对丘濬研究的普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对丘濬著述有较深入的认识,就是从获赠的《丘文庄公丛书》开始。

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丘濬的著作逐有增加,水平亦较过去提高,发表的文章不下十数篇。但当时中国大陆的研究较受到政治气候和学术潮流的影响,研究的范围还是相当狭隘,学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经济的课题上,有关丘濬的整体研究仍是甚为缺乏。其中如赵靖的《丘濬: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①、文浅父的《被遗忘的经济学家丘濬》^②、李普国的《论丘濬的经济思想》^③、吴申元的《丘濬经济思想初探》^④、黄国强的《略论丘濬的经济思想》^⑤等。

西方对丘濬的研究,除了《明代名人传》中有生平介绍外,成果不多。值得一提的是两篇有关丘濬的博士论文:Chu Hung-lam (朱鸿林),“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hsüeh yen-i b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Lee Cheuk Yin (李焯然),“Ch’iu Chün (1421~1495) and His Views on Government and Histor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此外,朱鸿林先生亦在 1986 年在美国《明代研究》发表“Ch’iu Chün’s Ta-hsüeh yen-i bu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Sixteenth

① 《北京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第 47~53 页。

② 《羊城晚报》1981 年 5 月 14 日。

③ 《江淮论坛》1981 年第 3 期,第 70~76 页。

④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81 年第 1 期,第 44~51 页。

⑤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第 84~90 页。